

社会主义思想史

第 二 卷

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1850—1890

〔英〕G. D. H. 柯尔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社会主义思想史

第二卷

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1850—1890 年

〔英〕G·D·H·柯尔著

何 瑞 丰 译

俞 大 畏 校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商 务 印 书 馆

1978 年·北京

A History of Socialist Thought: Volume II

SOCIALIST THOUGHT

MARXISM AND ANARCHISM

1850—1890

By G. D. H. COLE

LONDON, 1957

内 部 发 行

社会主义思想史

第 二 卷

〔英〕G·D·H·柯尔著

何瑞丰译 俞大畏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14印张 335千字

1978年9月第1版 197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9,500册

统一书号：2017·204 定价：1.55元

目 录

前 言	3
第 一 章 导言：1848 年以后的社会主义	6
第 二 章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德国社会主义—— 洛贝尔图斯和马洛	18
第 三 章 俄国社会主义的曙光——别林斯基、赫 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	35
第 四 章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比利时社会主义 ——柯林斯、卡茨和德·凯色尔	61
第 五 章 拉萨尔	75
第 六 章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第一国际	91
第 七 章 巴黎公社	136
第 八 章 第一国际的衰亡	175
第 九 章 巴枯宁	214
第 十 章 拉萨尔以后的德国社会主义——“基督 教社会主义者”和“国家社会主义者”—— 文化斗争与反社会主义者法	237
第十一章 马克思和恩格斯——《资本论》与《反杜 林论》	267
第十二章 无政府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 ——克鲁泡特金	314
第十三章 十九世纪下半叶的美国社会主义——	

亨利·乔治和丹尼尔·德·里昂.....	359
第十四章 英国社会主义的复兴——威廉·摩里斯.....	376
第十五章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社会主义	
——结束语.....	422
附：主要人物表	

前 言

有几位书评家对本书第一卷的编排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内容的安排应该以思想或者思想总动态为中心，而不宜以某某思想家的态度和计划为中心。这些书评家大概会比较喜欢第二卷，因为本卷比较接近他们所属意的那种布局。但是，还不能说是他们说服了我，因为这第二卷在第一卷的书评出现以前就已经安排就绪，并已写出大部分。我认为，在讨论 1848 年以前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时，有必要围绕思想家本人和他们所鼓动起来的运动来叙述，因为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实际上并不存在看法一致的围绕一个核心的社会主义运动。只是到了 1848 年以后，而且主要是到了 1860 年以后，随着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随着本卷所述的协会内部各个对立派别之间的斗争的展开，这样的运动才出现。事实上，协会内部的斗争是社会主义——作为影响一切经济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的国际力量——诞生前的阵痛。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斗争，实际上是许多对立倾向之间的一场混战，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居于关键地位；同时，德国的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之间的斗争（尽管争执的焦点完全不同），在法国的社会主义在巴黎公社起义中受挫以后，又使马克思主义者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新兴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形成过程中居于领导地位。有关这些事件和支配这些事件的思想的记载，有助于作出条理分明的叙述，而在处理 1848 年以前那些头绪纷纭的理论和运动时，研究社会主义的学者就远远做不到这一点。

当然，造成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是：社会主义运动在十九世纪 vi

六十年代的复兴过程中,第一次明确地成为工人阶级运动,支持这个运动的是由工厂、矿山、铁路以及其他较大行业中人数众多的产业雇佣劳动者所组成的强大无产阶级。理论家们不再在真空中创造理论了,也不再为基本上还没有组织起来的大批被压迫者创造理论了。他们不得不越来越多地考虑已获得巩固地位的工会以及某些政党的作用;这些政党在选民人数增加的推动下,倾向于参加议会活动,而不再从事组织群众暴动或革命密谋。他们也不得不更多地注意把大工业置于社会控制之下的问题,注意利用议会作为新的宣传工具或用来争取在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内部进行改革的问题。这种“改革乎?革命乎?”的问题一直到后期才得到彻底解决;关于这个问题,主要将留待本书第三卷再作讨论。但是,在六十年代,这个问题已经在英国、美国和瑞士提了出来,虽然在法国、比利时或德国简直还没有出现,在意大利也几乎没有出现,而在西班牙则根本没有出现。马克思主义以及五花八门的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和社联主义基本上仍然作为一种革命力量同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相抗争,后者包括从基督教社会运动一直到资产阶级领导的激进主义和“自由党劳工派运动”。但是耐人寻思的是,在第一国际中,马克思主义者已不再是极左翼了。

在撰写本卷时,我再一次受到语言的限制,我不懂俄文,德文所知极少,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几乎不懂。这就是说,我只好尽量依靠英法文资料(包括译文在内),特别是有关俄国和西班牙的资料大部分都是间接得来的。本书第三卷已经作出全面规划,并已写出部分草稿,第三卷所涉及的时期大致是从1889年第二国际诞生起一直到1917年俄国革命为止。我打算最后再写一卷来收尾,到那时可能再回过头来叙述1789年以前的社会主义先导思想。

vii 本卷多承各方帮助,深为感谢。艾塞亚·伯林先生再一次慷慨相助,特别是关于俄国的部分。H·N·布雷斯福特先生和莫里

斯·珀尔先生提出的批评和建议使我受益良多，他们两位都读了本卷的全部打字稿，并提出了极其宝贵的改进意见。约翰·普拉门纳兹先生读了本卷中的三章，即第六章到第八章，并提出有益的建议，盛情可感。关于比利时的一章，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的阿瑟·勒宁先生和吕特尔博士曾在著作引证方面惠予协助。承H·N·佩林先生厚意，惠借其当时尚未问世的大作《工党的起源》一书的清样。内弟雷蒙德·波斯特盖特和H·L·比尔斯先生，还有珀尔先生和詹姆斯·约尔先生，赐借藏书，特此再次志谢。还有我的秘书罗莎蒙德·布罗德利再一次卓越地完成了颇为艰巨的工作。

G·D·H·柯尔

1953年9月

第一章

导言：1848年以后的社会主义

就社会主义思想来说，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简直是死一般沉寂的时期。1848年欧洲各国的革命均告失败，欧洲大部分地区随之又重新建立起暴虐的警察政权，有一个时期几乎没有进行公开鼓动的可能，甚至也没有自由讨论社会主义思想的余地。凡是确有言论自由的地方，如英国、美国和瑞士的部分地区，都有法国、意大利、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流亡者在避难；正如在流亡者之间所习见的那样，他们内部意见分歧。他们大多数人都孤苦伶仃，潦倒不堪——至少大多数留在欧洲而又没有一技之长可以谋生的人是这祥。有一个时期，他们中的许多人只肯承认革命只是暂时失败了，因而殷切地等待并进行策划，以期重新出现爆炸性的局面，使他们可以重返祖国，继续战斗。当这种情绪持续不衰的时候，他们是不气馁的，但是这也使他们动辄斥责他们中间那些怀疑革命即将来临的人。随着希望的日趋黯淡，越来越多的流亡者或则在可能的情况下暗自妥协，悄然回国，或则离开欧洲前往美国，在那里他们更有机会得到温饱，并可以作为新国家的公民定居下来，如果愿意，还可以主要在本国移民中为“事业”进行宣传。

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其他一些成员也都是
在伦敦避难的流亡者。同盟在德国本土也曾短期秘密存在，至少
在莱茵兰是这样，在革命时期这里是同盟的中心。马克思和恩格斯
2 甚至还能够通过汉堡的一个出版商出版了几期《新莱茵评论》，在
这个刊物上他们开始对革命及其失败原因进行分析。他们已经明

显看出,希望革命运动迅速恢复是没有根据的。“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象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识到 1848 年的革命是经济萧条促成的,因而宁可等待下一次经济危机到来以后再发动新的革命起义。他们很快就愤怒地谴责同志中耐心较差的人,这些人已经在发表新的宣言,号召发动新的起义。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时并不知道需要等待多久,此后他们毕生一直在密切注视着经济方面的发展,渴望进一步出现毁灭性更大的资本主义矛盾。然而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及时地领悟到必须有一个等待时期,虽然连他们也没有立刻就认识到革命已经失败了。1850 年 3 月,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在伦敦重新建立起来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草拟了一项宣言,宣言以这样的假定为出发点:新的革命高潮正在到来,并将汹涌向前,足以使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无产阶级的帮助下取得政权。宣言号召工人帮助“民主派”争取胜利,然后又告诉无产阶级要是获胜的小资产阶级在于已有利的时机遏止革命应当如何采取行动。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证说,面对这种企图,无产阶级的任务是“不间断地进行革命”^②,直到把一切有产阶级赶下台、政权归于无产者为止。他们说,这就需要“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

① 卡·马克思:《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488 页。——译注

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85 页。——译注

且在世界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① 我们可以看到，这段话预示了 14 年后马克思着手建立国际工人协会时所抱的那些希望。

政治逆流和经济复苏共同起作用，把各主要国家革命运动的残余部分摧毁无遗，而革命的希望也就随之很快黯淡下来。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委员会里能够控制多数，但是在 1850 年 9 月，他们在同盟里却面对一个仍然号召再次发动革命并对大部分共产主义流亡者具有更大吸引力的少数派。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使用了 20 多年以后他在第一国际使用的同一战略，即利用他所掌握的微弱多数把共产主义者同盟总部从伦敦迁往科伦。留在伦敦的一伙又分裂为二，以奥古斯特·维利希（1810 年—1878 年）^② 和卡尔·沙佩尔（1813 年—1870 年）为首的分裂派成立了一个对立的组织。不久以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伦敦区部就成了一个无所作为的小组织，形同虚设。

在德国，共产主义者同盟面对着越来越严重的迫害，只能进行地下活动，不久全部活动都停止了。它的一个主要成员裁缝彼得·诺特荣克于 1851 年 5 月被捕，普鲁士政府根据从他身上搜出的文件逮捕了中央委员会的全体委员。他们未经审讯，在监狱里一直被关到 1852 年 10 月。在此期间，一些流亡巴黎的德国人也被法国警方逮捕，以参加法德两国人共同策划的叛乱阴谋罪被判处徒刑，这一罪名看来基本上是法国警方捏造的。巴黎的这个团体同
4 科伦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并没有联系，普鲁士警察当局企图证明它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85 页。——译注

② 维利希原是普鲁士炮兵军官，曾参加 1848 年的德国革命斗争，1849 年逃到伦敦。他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积极成员。1853 年，在他的再次起义的计划失败后前往美国。他在美国参加了南北战争，为北方作战，后来当了将军。

们之间有联系的伎俩并未得逞。马克思曾亲自进行部署，揭发警察当局为陷害科伦共产党人而捏造证据的罪行，但是这一揭发并没有能够使他们得救。审讯几经拖延以后终于举行。虽然当局不得不承认文件是捏造的，而大多数被告还是被判处了长期徒刑。共产主义者同盟解散了；背叛同盟的反对派也消声匿迹了。维利希移居美国；沙佩尔重新加入了伦敦那个仍然接受马克思领导的小组织。

马克思用德文写了《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这本篇幅不长的书，揭发警察当局的伎俩。这本书在瑞士付印，打算秘密运往德国，另一个版本差不多同时在美国问世。但是瑞士版在德国被警察查获，因而进入德国的为数很少。即使马克思的这本暴露性著作流传得更加广泛，那也无补于实际，因为反动派的地位十分稳固，即使是最有说服力的揭发也无法动摇它的权力。早在1851年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把坏事当作好事，彼此庆幸自己的孤立，因为这样就完全不需要修改自己的理论去迁就他们原先被迫一道采取行动的那些人的不成熟见解或理想主义缺陷了，同时还可以充分掌握时间和资料去制定更加完整的基本原则。马克思早已希望尽快出版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著作，可是其中的第一部分（《政治经济学批判》）事实上直到1859年才问世。他们的重大障碍是马克思生活非常贫困。正是为了能够帮助自己的朋友，恩格斯才勉强回到曼彻斯特，重新到自己家庭企业所属的英国公司中任职。由于他们分居两地，后人才得以继承两人之间来往的大量信札；他们持续不断地通信，直到恩格斯将近20年后回到伦敦居住时为止。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英国在工业发展方面稳执牛耳。举凡大规模生产、工厂制度以及运输工具都远远超过其他国家所达到的阶段。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并有大量资本和作为资本的商品——

特别是铁路设备——输往海外进行投资。棉纺织业在输出价值方面仍稳居第一位——约为同钢铁业争夺亚军的毛纺织业输出价值的3倍。但是钢铁和其他金属品——机械、金属器具、工具等等——的输出量也正在迅速增长。在进口方面，食品特别是谷物的输入增长迅速，而肉类、黄油、干酪和果品等也有增无已。轮船的数目和吨位大幅度地增加，而帆船的数目和吨位并没有减少。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固然发生过经济衰退，其中包括1857年（即上次危机发生后的10年）的金融危机，然而总的趋势却是在蓬勃发展，而且1857年的危机就其社会影响来说，比1847年触发欧洲革命的那次危机的危害性要小得多。1857年的危机也是国际性的，发端于美国，但是没有10年前那场危机所具有的那种政治影响。不论在法国还是德国，上层资产阶级都已经不再是潜在的革命力量了；当然，英国的上层资产阶级在1832年就已经不扮演这种角色。并没有迹象表明小资产阶级会采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年所希望的那种主动行动。工人基本上没有组织起来，而且从任何角度来看，力量都太薄弱，难以单独采取行动。在英国，熟练工人忙于组织工会，而在五十年代后期也确实开始了那场导致他们在1867年取得选举权的议会改革运动；约翰·布莱特所领导的中产阶级激进派也开始活跃起来。

本书第一卷已经谈过，甚至在1848年以前，宪章运动就已经开始消逝，尽管厄内斯特·琼斯曾力图挽回颓势，但在整个五十年代它一直在日趋末落。在这10年终了的时候，作为一个运动它已经不复存在了，代之而起的是以熟练工人的新兴工会为骨干的比較温和的新改革运动。为成年男子选举权而再次触发的骚动直到六十年代才真正活跃起来或蔓延各地。在五十年代，虽然工会迅速发展，但是工会领袖全神贯注的仍然是巩固他们在某些行业中的地位，而不是在更加广泛的领域采取一致行动。1851年成立的

机器工人联合会由于1852年普遍出现闭厂拒工的情况而几乎解体，需要时间来恢复元气。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壮大起来的全国矿工工会经过10年不断的斗争已经精疲力尽，矿工们一直到六十年代才发动一个新的全国性运动。棉纺业工人部分由于出口兴旺，获益不浅，在各区相继争取到集体谈判权，并根据1847年的十小时工作日法确立了熟练工人的地位。棉纺工人也许是各主要行业技术工人中组织力最强的工人，他们同熟练的机械工人一起成为大工业中的贵族。最后，到五十年代终了的时候，伦敦工联理事会成立了，这是承认有必要在更大的范围内采取行动的第一个迹象；其成员有若干主要工会的主要工作人员。理事会主要是从1859年帮助伦敦建筑工人进行斗争的临时机构脱胎而来的，它的主要目的是在劳资纠纷中互相支援。但是理事会从一开始就具有更广泛的职能，部分地起了中央机构的作用，始终为工人阶级的要求和疾苦而工作，直到六十年代建立起全国改革联盟和职工大会为止。这两个机构是出于加强同北部和中部工业中心的联系的需要而成立的。

新工会运动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机械工人和其他工人中得到迅速发展，在六十年代又大大扩展了活动范围。当时它主要是熟练工人的运动，这类工人终于开始从英国的高额生产率中得到一些好处。然而他们争得的利益是没有保障的，似乎取决于他们能不能防止资方招收太多的新工人进入他们所从事的行业，或防止资方找出办法取代他们的技术。因此，技术工人工会往往采取限制性的方针，设法严格控制学徒制或变相学徒制，并且拒绝接纳非熟练工人参加工会。这并不是说他们不准备在政治方面为整个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因为到了投票的时候，它们显然需要非熟练工人的帮助。但是就工业而言，这也确实意味着他们往往并不同情基础广泛的组织，因为他们害怕被淹没在不掌握技术的群众之中。发

展中的合作运动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样。在合作运动中，消费合作社很快超过了所有其他类型的合作社。如果认为罗契台尔先驱者合作社或者是 1844 年以后按照“罗契台尔的方式”成立的许多社团在工人阶级工资最低的工人中间有大批追随者，那是错误的。这类合作社主要吸引的是经济比较富裕和节俭的人，这些人可以用现钱买东西，并把每周收入的小量节余储蓄起来。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消费合作社之所以迅速发展，正是因为工厂工人、矿工和其他熟练工人阶层中，收入比较正常的人数大增，他们除了用现款购物外，还可以进行小额投资，同时也是因为消费合作社为来源方便的节余提供了出路，为工人阶级中克勤克俭的工人提供了最可靠的保障。这就难怪第一国际的社会主义者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讨论应该如何对待日益发展的合作运动时，曾有很多人表示疑虑说，消费合作社正在帮助培养脱离无产阶级主体的工人贵族，它们支付股息和买货分红的做法是在把资本主义的生财之道教给这批贵族，使之成为“劳动力”剥削制的保卫者。

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虽曾竭尽全力，设法通过工业和勤俭会社法案使各种类型的合作社取得牢靠的法律基础，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同样心怀疑虑，因而把他们的热忱主要倾注在生产合作社上，8 他们打算在基督教事业的基础上创办这种生产合作社。但是到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组织劳动协作社的试验大多数已告结束，生产合作社从此衰落了，直到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的大兴旺时期才恢复过来。另一方面，消费合作社则大有发展，但它们同创立罗契台尔先驱者合作社的欧文派社会主义的一切联系却完全中断了。参加消费合作社的新社员越来越多，特别是在北部和中部，主要原因是能够获得直接利益：货真价实、买货分红、为小额储蓄提供了有合理保障的投资机会，而不是出于任何理想主义的动机，也不是因为他们在合作社中看到新社会制度的

任何端倪。理想主义者如爱德华·范西塔特·尼尔、乔治·雅各布·霍利约克和威廉·库柏以及其他许多人仍然很活跃，但是在运动的实际工作中，他们的意见却被讲求节俭而日益支配董事会和季度会议等决策机构的新人物淹没了。

因此，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国看来已经坚决背弃社会主义和革命，并决心充分利用资本主义了。与此同时，大陆上的人们越来越把合作运动说成是一种手段，可以使工人——不如说其中的勤俭者——摆脱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想法，并能赢得机会改善经济地位和扩大自由，而不致威胁或者损害已经确立的社会秩序。在法国和德国，特别是在德国，关心社会问题的保守分子和重视社会问题的“开明”进步分子中间都有提倡合作运动的人：保守分子希望旧秩序和头脑清醒的工人结成联盟以抵制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鼓吹合作运动的开明人物则相信，出现不准驾驭的工人阶级企业家队伍会加强“自由企业”的力量，工人中的合作运动者在争取建立立宪责任制政府的斗争中能够成为资产阶级的同盟者。在德国，维克多·艾梅·胡布尔（1800年—1869年）代表保守派；海尔曼·舒尔采-德里奇（1808年—1883年）代表提倡合作运动的“开明派”，鼓吹这是一种旨在改善工人阶级状况而不危及社会安宁的自愿运动；而美因兹地区主教、基督教社会党人威廉·伊曼纽尔·冯·凯特勒（1811年—1877年）则尽其全力争取天主教会站在合作运动这一边起阶级调和的作用。在消费合作运动的力量很薄弱的法国，拿破仑第三政府对于赞助生产合作社很不热心，要求它们脱离工会和革命组织，作为国家生产机构，在同其他商业企业竞争中承包数目有限的合同，为国家服务。

总之，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英国和欧洲大陆上的合作运动在各种影响之下，都同社会主义中断了联系，而且还有人在某种范围内进行怂恿，企图利用合作运动把工人阶级活动引入非革命性和

非政治性的轨道。在大多数大陆国家，工会运动由于政治失败而陷于分裂；设法保留下来的地方性行业工会也发生根本变化，仅仅从事互助会社的工作，或者是通过到处流浪寻求就业机会的工匠维持松弛的联系。只有在英国，工会运动才得到稳步发展；不过这种发展也只限于熟练工人而已，而且到了六十年代工会运动的生存权利也受到进一步挑战。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便嘎然而停了。1848年，乌托邦设计师的伟大时代无疑已经结束，虽然在美国仍有遗风流韵；在那里，傅立叶主义仍然是一支活跃的力量，卡贝以及傅立叶的弟子孔西得朗都在设法证明乌托邦社会是切实可行的。美国当时仍然处在一个有可能创建这种公社的阶段，它的疆界不断扩大，在已开发地区之间的空隙地带仍然纷纷出现新移民区。而在旧世界，创建公社实际上已经行不通了，只有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俄国、西班牙和葡萄牙除外。在这些国家，傅立叶主义多少还有立足的
10 余地。但是，就是在这些国家也象在西欧一样，1848年以后的政治条件对于乌托邦实验也非常不利，除非有地主竟然愿意完全按照家长制来经营他的地产。在西欧，1848年以后就不大可能再从事这种实验了。最大的尝试也只是一种分红制，这方面的先驱者是埃德梅·让·勒克莱(1801年—1872年)，他是巴黎一个白手起家的油漆匠，早在1842年就已开始同手下比较熟练的工人分红了。勒克莱的实验直到1850年他出版了小册子《贫困与摆脱贫困的方法》，才为世人所知。法国警察给了勒克莱不少麻烦：他希望同自己的雇工签订一纸约束自己的明确的分红合同，但是没有获准，因为法律禁止老板同工人签订合同。于是，勒克莱便不得不越出法律的范围办事，而且坚持了下来，并逐步把分红制推广到手下的全部雇工，同时又保持了以技术和劳绩为基础的差别工资制。继勒克莱之后，让·巴普提斯特·安德烈·戈丁(1817年—1888年)